

为政尚异论

章士钊文选

李妙根 编选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为政尚异论

——章士钊文选

李妙根 编选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为政尚异论

——章士钊文选

李妙根 编选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冠生园路393号 邮政编码200233)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美术印刷厂分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2 字数 288000

1996年6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80613-225-2/B·39 定价:18.00元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总序

我们正遭逢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巨大的社会变动：从“中央之国”成为世界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伴随着社会巨变的是思想巨变。思想之变是从“浅层次”开始的，即对“先务之急”作应变的探讨。“先务之急”是西方军事力量进犯难以抵挡，于是第一位的应变思想是“师夷之长技”。造船造炮不能解决问题，人们接受了“须从社会变革入手”的思路，于是兴起思想巨变之大潮，至今未衰。我们仍在这场社会巨变之中。人们曾经以为，1949年如果说不上是世界历史新纪元之开端，至少也基本结束了中华民族社会结构之巨变。然而近二十多年的经历，特别其中两件大事，“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昭示我们，这场巨变尚不可言其结束。整个这段历史中，各种思潮纷然杂陈，光怪陆离。然而思潮并非思想。思潮往往是诸人群之趋向未必准确、未必恰当的一种表现方式。思潮倏忽更迭，配得上称为思想的却遭冷落。这种情况或许出于社会的注意力集中于急务。关于近代起于何时的划界可以作为例证。虽然大家都说中国近、现代史是中西文化相互作用过程，却不取明朝采纳西历，而取1840年英国炮舰进攻广州为“近代”起点。须知历法向来是中国社会头等大事之一，有时是用以象征政权的！历史分期表达的是中华民族对时代本质的感受。在分期基准上，炮舰比历法得到了更重要的关注，证明国

人以“急务为先”作为第一准则。急务为先则思想退后，时间长了，连思想也专注于急务，忘记了自己的根本——求道。大道迷失，后果是对急务争执不已，心气浮躁，冲突愈演愈烈……

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思想理论的作用。现在需要的是阐明大道的思想。阐明不可能凭空出现，思想的事业总要有所依凭。前人的思想对我们总有参考作用，因此需要了解前人的思想。读他们的书是途径之一。为了满足读者当下的需求，有必要从书海中检选出一些思想家的论道之作。

关于近代与现代的划分有很多说法，考虑到在两个最大的问题上，一个是中国社会正在进入现代世界，另一个是在上述过程中中国社会内部同时进行着中、西文化激烈的相互作用，这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没有根本不同。所以这两个时期的作品都考虑收录。这段历史事件繁多，人物大量涌现、更迭，思想引出思潮、思潮远离思想，纷繁迷乱，检阅、审理甚为不易。何为“论道之作”？体用不二、道器无间，论器者常常即是论道。强分之，必有毛病。不分，又难免堕入停留于实际急务之窠臼。检选关乎哲学者较为近之。何为“思想家”？或许是最有争议之处。一则思想与思潮不易区分，再则鉴定谁为思想家须高于这些思想代表人物，不用说我们远远不及，历史也尚未进展到足以作出决断的时候。入选的个别作者或许只能算个思潮代表人物，他能否归入思想家之列，只好由读者和历史判定。好在现在并非要对人物作出历史结论，目前的需要只是从前人的书本中引发出我们现在对大道的追寻。这套丛书仅为提供材料而选，其本身不是为了争论，因此尽量不属入我们自己的倾向，各派思想凡有代表性且深思及大道的，一律平等对待，使其有一席之地。我们相信经过多年反复考验的读者自有鉴别能力。

在这个时代，我们优于前人的是，我们有了一个半世纪的正

反历史经验,可以用来对照各种思想,思考其是非。这是我们的前人在写下他们的著作时所没有的。如果有了这样优越的条件还不能超过前代思想家,我们在历史面前真是应该感到万分的惭愧。中华民族已充分觉醒,国力正在迅速崛起。深思的时代正在来临。我们愿借此丛书与全民族同思大道。

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四年九月

编选者序

李妙根

章士钊(1881—1973),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字行严,笔名有黄中黄、秋桐、青桐、孤桐、柯老人、无卯等。早年就读于两湖书院、南京陆师学堂。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拒俄运动兴起,在上海加入军国民教育会,任军事教习。曾翻译日本人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落花梦》,改题为《大革命家孙中山》出版,遂使国人知重孙中山。任《苏报》主笔,倡言革命,又参加过华兴会的筹备工作,任其外围组织“爱国协会”副会长,曾因涉嫌刺杀清廷要员被捕。《苏报》上的不少文章出自他的手笔,写得文法谨严,论理充足,笔意恣酣,声容激壮,以“少年能文”为时人称道。参与创办《国民日报》,出版《苏报纪事》《沈荇》等革命小册子。1905年留学日本。1907年编纂《中等国文典》,在上海出版,得款后与妻吴弱男走英国,在苏格兰大学修硕士学位。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1912年回国主《民立报》笔政,兼任江苏都督府顾问,后又与王无生别刊《独立周报》。次年,起草二次革命宣言书,被孙中山委为讨袁军秘书长。1914年在日本东京,与陈独秀等创办《甲寅》月刊,7月,任欧事研究会书记。1915年任肇庆军务院及两广都司令部秘书长。1917年,章士钊在北京出版《甲寅》,先日刊,后周刊,7月停刊。1918年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1922年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旋任《新闻报》

主笔。1925年复刊《甲寅》周刊。是年兼任教育总长，压制学生爱国运动。寻任执政府秘书长。1927年李大钊被捕，与杨度等多方设法营救。1928年底，因遭南京政府通缉，赴欧洲。1930年回国，任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

九一八事变后，章士钊在上海执律师业。三四十年代，章士钊成为名闻全国的大律师。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寓被捕。次年，江苏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对陈起诉，章与陈是青年时代留日时知己，因不取酬劳，义务为陈辩护，阐明了反对政府倒行逆施不能视为叛国的道理。时人称此举有“古义士之风”。1934年，章士钊任上海法政学院院长。1936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参政。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避居沪上，拒绝汉奸梁鸿志引诱入伙，1939年赴重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3年，章著《逻辑指要》一书在重庆出版。抗战胜利后，章士钊接办了许多汉奸案。汪伪时期任行政院长、监察院院长的梁鸿志，是章在安福系时代的挚友，但章在为他辩护时，所写辩护状开首即说，“窃被告虽曾为汉奸”，坚持了民族立场。梁被处决后，章士钊收养其遗孤十年。在中国司法史上传为美谈。

1949年，章士钊为南京政府代表团成员赴北平（今北京）和谈，谈判破裂后留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据章含之《我与父亲章士钊》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章士钊敢于上书毛泽东，对打倒刘少奇提出异议，要毛顾全大局，制止分裂。又上书刘少奇，为被定为“黑修养”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辩护。1971年，其多年研究的成果《柳文指要》一书出版。1973年5月赴香港探亲，7月1日病逝。

章士钊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活了92岁，从清末到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思想上，

政治上，走过了曲折复杂的道路，一生的经历十分丰富。他主持过多个报刊的笔政，出版过不少专门之作。就为政的要言妙道而论，他宣传过反清革命，宣传过资产阶级代议制，又宣传过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在他大量的论著中，要编选一个完整反映他一生的思想学术变化的集子，实为不易。这个集子，只能大体反映他的思想概貌，且偏重论政之道这一类，遗漏不全之讥，在所不免。

在我看来，在章士钊众多论述为政之道中，强调为政不能“尚同”，而要“尚异”，不能一，而要二，似乎是比较一贯和突出的思想。辛亥革命之后，他主《民立报》笔政，斯时，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政府，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他引用英国政论家梅依的论述，认为实行政党政治的唯一条件，在“听反对党意见之流行”。（见《政党政治之唯一条件》）在议会里应有不同政纲的两派，但依据中国的具体条件和西方资产阶级议会的历史经验，他不主张两院制，而主张一院制（见《一院制议之发端》、《二院制足以救国会之专横确乎》等）。反对独裁，更反对复辟帝制。在《政本》一文中，他说，“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把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结合中国的思想资料，上升为“尚同”、“尚异”的理论，即为政的“道”的高度，进行论述。这些论述反映了他试图融会中西思想的努力，尽管带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但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自有其研究价值。

章士钊的大量论著和译作，除专著外，只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过《甲寅杂志存稿》，可说是章的自选集，而大量的其他论文，特别是其辛亥前后的论述，均未收入。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近半个世纪以来，未见出过他的选集之类。我们这次所选论著，均录自当时报刊，《甲寅杂志存稿》收录的，则录自该书。原文只有断句，此次均作标点，繁体和异体字，改为简化字和通用字，因报刊汗漫无法辨认的地方，用□代替，有夹注的，一仍其旧，用

页末注的,则一律移至篇末。限于学力和条件,编选不当之处,盼识者指正。

1995 年 10 月,于空军政治学院

目 录

编选者序	李妙根
读《革命军》	
王船山史说申义	3
论平民政治	13
论统一党	16
论同盟会	19
一院制议之发端	21
二院制足以救国会之专横确乎	24
论统一制	28
鄂游感书	31
驳《神州日报》论保障人民自由权不宜效英国制	
废行政裁判所	33
再妄贡己见于《神州日报》记者	36
进(论)行政裁判制度	39
论主权	42
政治之新经验	45
政党政治之唯一条件	47
政党政治与新闻	49

释党争	51
说本报之态度	52
毁党造党说	55
总统集权说驳义	58
《独立周报》发端	61
变更政制之商榷	63
国税与地方税	66
约法与统治权	69
政府责成与议会解散权	74
主权与统治权	78
主权无限说	85
箴北京	88
政本	91
读严幾道民约平议	108
爵气	127
国家与责任	129
《甲寅》记者答陈独秀	152
政力向背论	154
自觉	177
调和立国论	185
学理上之联邦论	214
时局痛言	233
复辟平议	241
共和平议	259
国家与我	280
说宪	290
帝政驳议	297

民国本计论·····	326
评梁任公之国体论·····	342
《甲寅日刊》发端·····	347
国教问题·····	352
一院制之主张·····	354
理想之一院制·····	357
议会之品格·····	362
参议院减少名额之主张·····	363
论解散权与不信任投票·····	366
论行政裁判·····	370
宪法问题·····	374
评新文化运动·····	377
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	385
农国辨·····	388
《逻辑指要》自序·····	394

读《革命军》

今日之有心人，虑无不言教育普及。教育普及诚善矣，虽然，吾不知其所欲普及之教育，其内容果奚若？将曰求知耶？练技能耶？非普通之人所不可缺者耶？顾其不可缺也，犹之目之视，耳之听，口之言，手之执，为器械之运动，受动者而非主动者也。主动之权，在乎其脑。其脑而野蛮与，其耳目手口与之之为野蛮之举动；其脑而文明与，其耳目手口亦与之之为文明之举动。知识技能之于主义也亦然。奴隶主义者，以其知识技能尽奴隶之职；国民主义者，以其知识技能尽国民之职。夫以奴隶主义之人，而增其知识，练其技能，则适足以保守其奴隶之范围，完全其奴隶之伎俩，将使奴隶根性，永不可拔。是其非教育界之罪人，而我国民之公敌哉！居今日我国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导之脱奴隶就国民。脱奴隶就国民如何？曰革命。

虽然，革命者，欧洲前世纪之产物，而近十年来，始稍稍输灌其思想于我国者也。求之我国历史，自汤武以来，一切惨剧，或成或败，无不始于盗贼之计，持以噢咻之术，要以奴隶人为目的，无一足以当今之所谓革命者。以此奴隶根性深固之人，而骤更其地位，如戒鸦片，如劝不缠足，殆无不扞格。呜呼！此其所以待教育也。

教育之术，在因其所以知，而进以所未知；因其潜势力，而导

之以发达。吾国乡曲之间，妇孺之口，莫不有“男降女不降”、“老降少不降”、“生降死不降”之谚。而见满人者，无不呼为“鞑子”，与呼西洋人为“鬼子”者同。是仇满之见，固普通之人所知也。而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各省以压制奴隶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外乎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复一切压制之策者乎？是以排满之见，实足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所以不能不经之一途也。居今日而言教育普及，又孰有外于导普通仇满之思想者乎？然使仅仅以仇满为目的，而不灌输以国民主义，则风潮所及，将使人人有自命秦政、朱元璋之志，而侥幸集事，自相奴畜，非酿成第二革命不止。又使艰深其文，微隐其旨，以供成学治国闻者之循玩，则亦与普及之义相背驰矣。

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捋扯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李商隐于韩碑，愿书万本诵万遍，吾于此书亦云。

（原载于《苏报》1903年6月9日，

署名：爱读《革命军》者）

王船山史说申义

亡国多才，自古已然。王船山者，亡国之一国民也，故其言皆亡国之音，所说多亡国之惨。今绎其义，可得而言。

船山在当日，伏处南疆，艰贞绝学，与李二曲、孙夏峰、黄梨洲、顾亭林共称讲师大儒。而船山之书独晚出，直至洪杨荡定之后，曾国藩始辑遗书刻之，其说大倡于湖湘而遍于天下。夫张李时代，为他人驱除难而致其国，天下迄定，而船山方殚精而著书；至洪杨时代，天下一转捩而所以驱除之者仍不异畴昔，天下亦迄定，而船山之书适于是时大发明。是何故欤？嘻！吾知此后其被吾船山之影响者必无量，而必生出许多之波动，则敢断言者也。惟其书之窍要处，多用□□字代之，是殆削于曾氏之手。此亦何怪其然。然无别本之可校，爰就确不可移之义，为之补亡，其标识则在左肩左脚之间也。

自拓拔氏之兴，假中国之礼乐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为中国之民，且进而为士大夫，以自旌其阀阅矣。高门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皇之支庶，婚宦相杂无与辨之矣。汉魏徙戎于塞内，空朔漠以延新起之夷，相踵相仍如蟹之登陆，陵陵借借以继进，天地之纪乱而不可复理。乾坤其将“圯”乎，谋之不臧，莫知其“祸”之所极，将孰尤而可哉。

按：种姓之辨，不外风习、血液二者。能风习既同，

血液复混，是无从而辨之。故拓拔氏当时冒中国之文化，复以亡国之虏，经数传而窃中国之种智以同于我，此自我之同化力之所致。高门大姓，亦有所以得之所以与之者也。胡元之祸，较之拓拔，则妄分蒙古、色目为一级，汉人为一级，南人为一级。此视为士大夫，仅自旌其阀阅者，其相去果几何？夫冒我族姓，则彼族自知其不肖，而欲以吾种易之也。乃当元之时，至有窜易其名为“不肖都”“拔古台”等字者（见赵瓯北念二史札记中），此又谁为不肖也。呜呼！若夫取其职官之志而读之，某官某得几员，某官某得几员，则对于“高门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之一言，尤可痛心。宦相杂而婚悬为禁，且以为贵胄也，而忽弛之，谁应之者。风习本我之国粹，而血液亦实无可言，何谓“新起之夷”，吾宁易之曰“将亡之虏”。

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治统之乱，权奸窃之，盗贼窃之，夷狄窃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道统之窃，沐猴而冠，教猱而升，尸名以徼利，为“夷狄盗贼”之羽翼，以文致之为圣贤，而恣其妖妄。呜呼！至于窃圣人之教以宠“夷狄”，而祸乱极矣。石勒起明堂、辟雍灵台，拓拔宏修礼乐、立明堂皆是也。败类之儒，鬻道统以教之窃，而君臣皆自绝于天。故勒之子姓，骈戮于冉闵，元氏之苗裔，至高齐而无噍类。天之不可欺也，如是其赫赫哉！

按：夷狄盗贼之敢于窃天下者，以恃有败类之儒为之送徽号而颂功德也。夫人未有能自欺其心者，夷狄盗贼，岂不自知为夷狄盗贼，不过吾虽夷狄盗贼之肺肠，而已作圣明天子之面目。工部具一奏曰修圣庙，礼部具一奏曰开鸿科，而天下之士走集而相庆者，已填骈于日下，则文化大起，居然圣庙，昨日之夷狄盗贼，则永远之